

经济学研究当为高质量发展服务

黄泰岩

内容提要:近年来,经济学界围绕高质量发展发表了大量研究成果,但还远不能满足高质量发展实践的需要,主要表现为缺乏指导发展中国家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完整系统的经济学理论。中国经济

学者应抓住创新这个牵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牛鼻子”,努力揭示创新发展规律;抓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经济工作的主线,深化促进高质量发展的经济政策体系研究。

发展的经济学理论。

经济运行、经济发展等诸多方面的影响,有赖于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创新的支持。为了更好地推进科技创新,经济学研究应深入揭示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对科技创新的作用。一是揭示理论创新对科技创新的作用。理论创新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理论创新,为科技创新提供理念、理论、方向、机制等方面的指引,是科技创新的引领。二是揭示制度创新对科技创新的作用。制度创新为科技创新提供强大制度保障和不竭动力,主要体现在通过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科技创新提供体制机制安排,激发广大科技人员的创新创造活力。三是揭示文化创新对科技创新的作用。文化创新为科技创新提供社会文化条件,主要体现在通过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形成全社会勇于创新、鼓励探索、宽容失败的创新文化氛围和激励机制。

量发展的经济政策体系研究,需要揭示我国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的历史必然性;揭示供给侧政策体系与需求侧政策体系的区别与联系;揭示经济政策体系的构建必须遵循我国经济发展规律、适应新时代发展要求,既不能重走计划经济老路,也不能照搬西方供给学派的政策体系。促进供给侧结构优化应当成为经济政策体系研究的落脚点。为此,要对政策实施对象进行精准识别、科学分类,明确鼓励什么、限制什么、禁止什么,并制定相应的差别化政策,实施定向分类指导;加强对政策体系的顶层设计研究,突出政策体系的系统性、协同性,形成最优的政策制定机制;突出结构优化政策的精准

性、有效性,深入研究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分配政策、技术政策、对外经济政策等在促进结构优化方面的作用机理,为政策分类设计和动态优化调整提供理论依据。改革开放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形成有效促进高质量发展的经济政策体系必须紧紧依靠改革。当前,要深化产权制度改革,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为科技创新奠定坚实的产权基础;深化要素市场改革,实现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深化“放管服”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解决政府职能错位、越位、缺位问题,全面提升政府治理效能。

(作者为中央民族大学校长、中国经济发展研究会会长)

努力揭示创新发展规律和影响创新的因素

推动高质量发展,需要积极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而跨越这一关口的关键是创新驱动。围绕高质量发展推进经济学理论创新,必须深化对创新发展规律的研究。

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是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支柱,对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障国家安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党的十八大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就是要推动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谁走好了科技创新这步先手棋,谁就能占领先机、赢得优势。当前,全要素生产率下降是导致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一个重要原因,而致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的主因便是我国在科学和工程等“更具挑战性”的创新领域取得的突破性成果还不够多、科技成果转化还不够充分。历史经验和今天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对我国进行技术遏制等的事实一再告诫我们:手中没有过硬的关键核心技术,就不可能公平地参与国际贸易和分工,也不可能自立于世界强国之林。关键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必须依靠自主创新。这就需要经济学研究全面揭示科技创新所包含的科学创新与技术创新的丰富内涵;全面揭示影响科技创新的主要因素以及这些因素对科技创新的影响程度和作用机制,抓住推进科技创新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提出科技创新的重点、路径、工具、方法;深入研究如何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建立彰显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科技创新机制;从世界各国和企业科技创新的丰富实践中总结经验、发现规律,推动我国科技创新。

科技创新受到经济制度、

深化促进高质量发展的经济政策体系研究

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是提升发展质量。这就需要抓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经济工作的主线,深化促进高质量发展的经济政策体系研究。

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必须在供给侧下功夫。深化促进高质

激励创新 引领发展——我国科技奖励制度在改革中完善

“五大奖”形成 国家科技奖励制度在改革中完善

1978年3月,党中央召开全国科学大会,会上对7657项科技成果举行了隆重的颁奖活动,标志着国家科技奖励制度的恢复

40年来,我国科技奖励制度在改革中不断完善



10余万人(次)获奖 国家科技奖励提升科学氛围

40年来

国家共授予10多万人(次)

国家自然科学奖 国家技术发明奖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三大奖

20个国家的113位外籍专家和2个国际组织、1个外国组织 国际合作奖

共授予 自然科学奖项目 1230项 技术发明奖 4112项 科学技术进步奖 12323项

地方科技奖励超6000项 多层次奖励促全面创新

目前,部级科学技术奖平均每年授奖约2500项 地方科学技术奖每年授奖约6500项

目前设立的面向全国范围社会科技奖励 达277项 每年授奖约13000项 成果(人)

新华社发(边纪红制图)

经济实践创新对经济学理论提出新挑战

信息技术革命呼唤经济学创新

蔡跃洲

经济学理论提出了新挑战,对理论创新提出了新要求。

以电子商务、网约车等为代表的平台经济带来自由竞争与垄断并存的市场格局,对微观经济学、信息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以及产业组织理论、就业和收入分配理论的创新提出了紧迫要求。

涵盖买家、卖家、平台三方市场的分析框架;结合福利分析,从权责界定、行为规范等角度探讨平台经济模式的监管与规制。

新模式、新业态对应的新型组织运行方式正在冲击工业社会以企业为核心的传统组织架构,重构经济社会运行中各方主体关系。这使制度经济学、产业组织理论的现实基础发生了变化。事实上,各种互联网平台的出现就是典型的组织运行模式重构。作为全新的市场主体,互联网平台既不是买家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卖家,却具有撮合成交的功能;买家和很多卖家虽然借助互联网平台实现交易,但在产权关系上与之没有从属关系。

对此,应从产权理论和制度经济学角度探讨新业态、新模式下的权属架构、激励机制,并密切关注经济社会组织结构重塑过程中不同群体的利益得失及其可能带来的经济社会风险。

人工智能对人类智力的部分替代,将对劳动就业市场带来结构性冲击,进而影响收入分配格局,并为就业和收入分配理论的创新提供新的素材。人工智能技术的推广应用可以看作推动自动化进程的新阶段。然而,与以往自动化技术对人类体力的替代不同,人工智能可以实现对人类智力的部分替代。如果说以往从体力劳动中不断解放出来的人类可以更多从事脑力劳动,那么在脑力劳动被部分替代后,还能

开发出什么样的更适合人类的新岗位?进一步看,即便最终实现新创造岗位与被替代岗位的总量平衡,受知识结构局限,被替代岗位的劳动者要成功转向新岗位也并非易事,难免出现结构性失业。对此,应结合以往自动化推进的历史经验和人工智能技术的特性,就其对经济增长、劳动就业、收入分配等的影响开展情景分析,针对特定情景给出相应预案。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



运用经济学新成果促进政策优化

洪永森

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需要加强政策评估与政策设计,提高政府精细化管理水平和驾驭经济的能力。政策评估计量经济学为政策评估提供了基于实际经济数据的方法,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为政策设计提供了有效的理论基础与方法支撑。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既要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又要更好发挥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作用。只有将两只“手”的作用都充分发挥出来、有机结合起来,才能有效提升资源配置效率。这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优势所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需要加强政策评估与政策设计,提高政府精细化管理水平和驾驭经济的能力。

加强和改进政策评估,使用科学的评估方法是重要前提。应针对薄弱环节,实行基于实际经济数据的政策量化评估,主要包括:实行事前评估,提高政策制定的科学性;实行事中评估,加强对政策执行的监控,及时纠正政策实施过程中的偏差;实行事后评估,检验政策的实际效果,为今后决策提供参考。

最近20年,政策评估计量经济学方兴未艾,为政策评估提供了基于实际经济数据的方法,已被应用于评估发达国家各种公共政策,如最低工资法对就业的影响、就业再培训政策对收入的影响、反歧视法对少数族裔就业的影响、福利政策对男女工人失业持续期的影响等。政策量化评估还可为政府精细化管理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比如,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麦克法登在上世纪70年代通过设计调查问卷和对调查数据进行计量建模,准确预测出通勤人员使用在建的旧金山地铁系统的比例,成为城市精细化管理的成功案例。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同志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对现代社会科学积累的有益知识体系,运用的模型推演、数量分析等有效手段,我们也可以学,而且应该好好学。需要注意的是,在采用这些知识和方法时不要忘了老祖宗,不要失去了科学判断力。”近年来,我国经济学界借鉴国外经济政策量化评估方法,结合我国国情进行理论创新,并将之应用于评估我国经济政策,如《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对香港经济的影响、高铁建设对地方经济的影响、“一带一路”项目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的影响等。不过,目前政策量化评估的研究和运用大多局限在学术界,亟须加强与政府部门的互动合作。学术界应积极向政府部门推介研究成果,政府部门应充分利用学术界的理论和方法优势,大力提升政策制定的科学性。

政策设计和政策评估同等重要。最近几十年发展起来的实验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为政策设计提供了有效的理论基础与方法支撑。行为经济学将经济主体的心理、认知、情绪、信息以及社会文化等非理性或非完全理性因素纳入研究框架,而实验经济学则借鉴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在可控实验条件下研究经济主体的决策行为。运用行为经济学理论与实验经济学方法进行政策设计有两大优势:第一,研究者了解数据生成过程,数据相对干净可控,有助于识别、推断因果关系;第二,实验方法以较小社会成本探索政策涉及问题的解决方案,有助于减少政策创新的阻力。

优化政策设计还有助于解决市场供需匹配问题,提升市场运行效率。例如,201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思和沙普利的稳定匹配理论与市场设计实践,为研究和改善市场功能提供了理论依据与方法支撑。根据该理论设计的匹配机制,解决了长期困扰美国医学院的实习医生分配以及肾脏器官移植匹配等问题。很多美国公司如谷歌、优步等,已开始与经济学家合作。经济学家根据稳定匹配理论与市场设计实践,结合相关公司的技术与数据,分析预测消费者行为,帮助制定精准营销策略。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在政策设计过程中,经济学可以为研究政策发布者、执行者、参与者、接受者的行为以及预测从政策发布到取得预期效果所需时间长短等提供理论支持,从而选择合乎预期效果的政策工具,优化政策实施方案。

需要注意的是,政策量化评估是基于计量建模假设与实际经济数据作出的,其准确性取决于这些假设在现实条件下是否成立以及经济数据是否可靠。同样,考虑到经济主体认知局限与认知偏差的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虽可为政策设计提供依据,但相对于现实经济环境,实验控制条件更为单纯,因而在将实验研究结论应用于现实时,需要考虑实际环境因素的差异。尤其要清醒认识到,在借鉴国外经济学的有益理论与方法时,只有根据中国经济实际进行本土化的理论与方法创新,才能真正为我所用,发挥积极作用。

(作者为教育部计量经济学重点实验室(厦门大学)主任、厦门大学经济学院与王亚南经济研究院院长)

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研究

——《刘诗白选集》简评

段月

《刘诗白选集》近日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共13卷、17册,收录了刘诗白从事经济学研究的11部著述和200多篇论文,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产权理论、所有制问题、经济改革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等。

该书具有以下特点:一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方向,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为指导,同时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吸收国外优秀学术成果;二是紧跟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步

伐,结合实际分析问题、研究问题,努力为我国经济改革实践构建一套富有解释力的理论体系;三是从所有制、产权制度、国企改革、科技创新等方面,对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问题进行全面分析阐述。该书对于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研究、推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积极作用。

新书推介

XIN SHU PING JIE

